

# 浅析 1967~ 1970年埃以“消耗战” 对埃及的影响

张 莹

**内容提要** 1967~ 1970年间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消耗战”对埃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及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伴随战争而出现的国民经济衰退、外交战略凸显瓶颈等情势,使得埃及领导人对这场战争进一步反思并谋求改变,遂开启了埃及改革的大门,为此后埃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提供了前提条件。“消耗战”中国家军事力量的恢复及增强、国民士气和民族自信心的提升无疑对埃及进行下一场战争,收复西奈半岛奠定了坚实的力量和精神基础。

**关键词** 国际关系 埃及 以色列 “消耗战”

**作者简介** 张莹,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郑州 475000)。

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sup>1</sup> 对于“消耗战”的发起国——埃及来说,“六日战争”后收复西奈半岛成为必须解决的首要政治问题。然而,当时的以色列在胜利面前丝毫没有撤兵意图,美、苏及联合国也都未能解决此事,抑或是安于现状,使埃及通过外交与国际谈判等途径实现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战争成为纳赛尔收复领土的无奈选择,但基于埃及自身实力在“六日战争”中受损且无力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现实,纳赛尔提出进行“消耗战”,即用炮火频繁袭击苏伊士运河东岸,消耗以色列的人力、物力、财力,用时间来消磨以色列人的意志,直至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

由于“消耗战”前承“六日战争”,后起“十月战争”<sup>④</sup>,长期以来人们对它的关注度较小。最早探究“消耗战”问题的穆罕穆德·哈桑宁·海卡尔,曾于1969年3月27日、4月11日和4月25日在埃及《金字塔报》(Al-Ahr

am)上发表了有关“消耗战”战略(The Strategy of The Attrition)的系列文章。此后,学术界对该问题亦有所涉猎。

从目前国外的研究成果看,有两本比较全面研究此次战争的专著值得关注,分别是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雅科夫·巴思曼托夫(Yaakov Bar-Siman-Tov)于1980年出版的专著——《1969年至1970年埃以消耗战:有限战争的研究范例》(The Israeli-Egyptian War of Attrition, 1969 - 1970 A Case-Study of Limited Local War),以及前美国外交官大卫·科恩(David A. Kom)于1992年出版的《1967~1970年间的埃以消耗战与中东大国外交》(The War of Attrition and Great Power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1967-1970)。

<sup>1</sup> [德国]克劳塞维茨著:王小军译:《战争论》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sup>④</sup> 指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因其发生在十月,又是阿拉伯人的斋月,故称“十月战争”或“斋月战争”,又因其开战之日为犹太教的赎罪日,故称“赎罪日战争”。

一些学者在学术论文中也会论及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消耗战”问题,主要有:艾哈迈德·哈利迪(Ahmed S.Khalidi) 1973年发表于《巴勒斯坦研究杂志》(*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秋季号的《消耗战》(*The War of Attrition*)、艾维·希莱姆(Avi Shlain)与雷蒙德·坦特尔(Raymond Tanter)于1978年7月发表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的《1970年以色列纵深轰炸埃及决策的制定、抉择与后果》(*Decision Process, Choice, and Consequences: Israel's Deep-Penetration Bombing in Egypt*, 1970)等。

从国内研究现状看,一些学者在著述或翻译的译著中部分涉及到“消耗战”这一话题,例如:刘竞等撰写的《苏联中东关系史》殷罡主编的《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季国兴和陈和丰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美国学者小隆·阿·诺迪安的《导弹时代的空中战争》日本学者田上四郎的《中东战争全史》穆罕穆德·哈桑宁·海卡尔的《通向斋月战争》(*Road to Ramadan*)、《斋月战争》,以及萨达特的《萨达特回忆录:埃苏关系内幕》等。综上所述,阿以“消耗战”研究尚未十分充分,尤其是国内的相关研究比较欠缺。虽然上述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消耗战”对埃及的影响,但大多是从埃及与苏联关系的演变过程,或是在陈述十月战争的背景方面有所涉及,而从政治、社会、经济、军事、对外交往等视角系统考量“消耗战”对埃及内政外交影响的研究尚待深入。

本文即结合“消耗战”期间埃及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战场的战局变化,从国民经济、国防部署、国民心理及对外交往等方面来探究这场风暴<sup>1</sup>对埃及的深远影响。

## 国民经济的衰退

战争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国家财力,特别是对于战争的发起国来说尤为如此。在埃及与以色列的“消耗战”期间,埃及国内出现的情况是,许多工厂停工待料,不少发展项目因战争之累被迫放弃。再加上苏伊士运河的关闭、旅游业的萧条和西奈半岛石油收入的消失,埃及国内经济发

展面临停滞甚至是倒退的危险。

首先,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使埃及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在“六日战争”发生之前的十年间(1955~1965年),埃及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率曾达到6%,而到了1967年,埃及国民生产总值却出现负增长情况,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又出现零增长,1970年虽然实现了正增长,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仍不及1965年以前的水平。<sup>④</sup>另据统计,1966~1970年,埃及国内固定资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减少了13.2%,国内储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减少了11.3%,进、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分别下降18.6%和15%。<sup>④</sup>其中,1968~1969年,埃及贸易顺差降为2280万埃镑<sup>1/4</sup>,1970~1971年这一数值更是跌至880万埃镑。<sup>1/2</sup>据估计,自1967年埃以战争以来,埃及由于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达到1000亿埃镑以上。<sup>3/4</sup>

其次,战争还消耗大量的人力资源,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一国经济在战争中的直接损耗不难计算,但是另一种重要资源——人的生命价值,却难以用准确的数字来表示。战争爆发后,大量原本从事民用经济活动的人力资源不得不参军,抑或是参与到军事设施的建设中,民用经济的从业者由此数量大大减少。“消耗战”期间,埃及有将近50万人被招募到军队中,在战场上交战,其他参与到军事设施建设中的劳动力更是不下百万。<sup>⑧</sup>至1970年6月,埃及在

<sup>1</sup> Abba Eban, *Personal Witness: Israel Through My Eye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92, p. 491.

<sup>④</sup> See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The Egyptian Economy”,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5, No. 1/2, Autumn 1975–Winter 1976, p. 225; Robin Barlow,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iddle East, 1950–197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4, No. 2, May, 1982, p. 137.

<sup>④</sup> [日本]小杉寿行:《埃及经济实行开放政策后的成绩》,载《亚洲问题研究》第7集,1987年,第164页。

<sup>1/4</sup> 埃镑是埃及的官方货币,一美元约合6.2埃镑。

<sup>1/2</sup> Robin Barlow, op. cit., p. 229.

<sup>3/4</sup> Robin Barlow, op. cit., p. 228.

<sup>⑧</sup> See David A. Kom, *The War of Attrition and Great Power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1967–1970*, Westview Press, 1992, p. 91.

战场上的直接伤亡人数约为 5 000 人。<sup>①</sup> 这些死伤于战争中的人，大多年轻力壮，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

再次，战争对埃及经济的间接影响也不能被忽视。战争打破了埃及原定的经济发展计划，使得原本就已延后进行的“第二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又被搁置到 1970 年“消耗战”后才被重新筹划。战争摧毁了大量基础设施。1967 年 10 月 25 日，埃及苏伊士城石油炼油厂被以色列轰炸，给埃及造成了 1 亿美元的损失<sup>②</sup>，1969 年 10 月~1970 年 4 月，以色列对埃及实施了纵深轰炸。这些基础设施的受损，延缓了埃及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使生产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量平民由此失业，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消耗战”期间，埃及政府为了战争需要疏散了运河区的约 25 万人，他们被迫移居至开罗和亚历山大的棚户区。<sup>③</sup>

## 国防部署与组织机构的完善

武器装备是军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影响战争的重要因素，人力则是军队硬实力中有形的物质力量。常规战争中，在作战双方拥有实力相当的军事硬件时，如何运用人力组织和部署常常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苏联在“消耗战”期间给予埃及的军事援助，使埃及的国防军事实力不仅得到重建和恢复，而且远远超越了战前水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军队人数方面，埃及通过一系列政策加大征兵力度，如征募高中生及原来被免除兵役的大学生；延长士兵服役时间；把对应征入伍者的补助延长至被占领土地解放为止等，使军队人数从战前的 18 万人发展至 1970 年末的近 70 万人。<sup>④</sup>

其次，武器装备方面，无论数量还是性能，埃及的军事力量都大大增强。据统计，1968 年，通过整编和扩充的埃及陆军拥有约 560 辆“T-54”或“T-55”坦克、300 门重炮、450 门野战炮、200 门迫击炮和 800 多辆轻型装甲运兵车、1 080 多门高炮和 30 多套“SA-2”地空导弹发射装置。埃及空军拥有 110 架“米格-21”

战斗截击机、80 架“米格-19”战斗机、120 架“米格-15”和“米格-17”战斗机、40 架“苏-7”战斗轰炸机、40 架“伊尔-28”轰炸机和 10 架“图-16”轰炸机。<sup>⑤</sup> 1969 年 9 月，法国通过利比亚转卖给埃及 100 架“幻影”军用飞机。<sup>⑥</sup> 1970 年底，埃及又从苏联得到 75~80 套“萨姆-④”型地空导弹发射装置，150 架“米格-21J”战斗机，4 台最新式“15-B”雷达，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先进和严密的防空系统。<sup>⑦</sup> 由此，以色列飞机不仅在埃及控制的运河领空内会完全暴露在这个防空系统之下，而且如果“萨姆-④”型地空导弹被移动至运河西岸作战第一线，运河东岸的以色列飞机也会面临危险的境地。无论在埃及控制的运河西岸，还是在以色列控制的运河东岸，以色列的空中优势都被削弱了。

再次，在组织机构方面，1968 年 2 月，埃及创建了空军国防委员会，它与海陆军地位相同。苏联大量补充了埃及空军，提供了数百架“米格”和“苏霍伊”战机，使其兵力比战前增加了 60%。<sup>⑧</sup> 并且，埃及修建了新的军事基地，以代替西奈半岛沙漠中被以色列占领的 5 个机场，并在所有的 20 个空军基地上修建了 500 座混凝土飞机掩体。<sup>⑨</sup> 运河与开罗之间的公路被拓宽，以应付战机的紧急迫降。埃及还通过加宽开罗至亚历山大公路某些路段的办法，修建了几条新跑道，并在附近修建了停机库和供应设施。1968 年，埃及陆军还建立防空司令部，以保卫埃及的领空。

<sup>①</sup> 殷罡主编：《埃及冲突——问题与出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年版，第 11 页。

<sup>②</sup> 殷罡主编：前引书，第 10 页。

<sup>③</sup> [美国] 乔恩·金奇、戴维·金奇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译组等编译：《中东战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版，第 390 页。

<sup>④</sup> David A. Kom op. cit., p. 91.

<sup>⑤</sup> [美国] 小隆·阿·诺迪安：《导弹时代的空中战争》  
[http://warstudy.com/history/cold\\_war/misile-air-war/006.xml](http://warstudy.com/history/cold_war/misile-air-war/006.xml)

<sup>⑥</sup> David A. Kom op. cit., p. 200.

<sup>⑦</sup> “Strategic Survey 1970”，Londo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1, p. 47.

<sup>⑧</sup> [美国] 小隆·阿·诺迪安：前引文。

<sup>⑨</sup> David A. Kom op. cit., p. 200.

第四,在人员能力方面,“消耗战”期间,埃及对军队进行了深层次改革,即对士兵进行再教育、对军官进行组织、训练和军事实战方面的培训。埃及国防部长法齐宣布取消军事运动会等体育、娱乐活动,对军队实行严格训练。士兵被送至学校学习,所有操作机械的士兵均受到了技术教育知识的培训。军队的高层军官,则需要学会与士兵进行深层交流,了解并且带领他们协同作战。

另外,埃及的飞行员培训计划也在大规模地展开,以增加埃作战飞行员数量,提高飞行员的技术。数百名年轻的埃及人被派往苏联进行专业的飞行培训。同时,在国内,埃及空军飞行人员在约100名苏联教官的帮助下,使用“雅克-18”、“L-29”、“米格-15”和“米格-21”等各类型号教练机对新成员进行训练<sup>①</sup>。埃及空军各级部队都配有苏联顾问,每个中队至少有一名。尽管如此,埃及飞行员的数量和能力仍远逊于以色列。

第五,在作战部署方面,除了少量用于开罗的防御外,埃及把大部分武装力量都部署在运河西岸前线,以陆军为例,6个师中的3个师及大部分火炮被布置在运河西岸第一线,并且随着“消耗战”期间战局的变化,适时有效地作了调整。

“消耗战”前期,埃军的部署以单一的陆军为主,作战方式多是远距离炮轰。1969年7月以后,以色列对埃及开始实施的空中轰炸使埃军地面作战部队、特别是炮兵的威力大大衰减。有鉴于此,埃及一方面继续加强空军的建设,另一方面加紧建立联动式综合防空体系。1969年10月~1970年4月,以色列对埃及境内实施空中轰炸,埃及人员损伤惨重,纳赛尔遂运用外交手段,从苏联得到了建立联动式综合防空体系所需的新式武器。“萨姆-④”型地空导弹发射器更是借着“消耗战”停战之机,被安置于运河西岸前线。

正是“消耗战”后期这一系列的部署,特别是联动式综合防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效地弥补了埃及空军战斗力短时间难以迅速提高的不足。在运河西岸,补充先进的防空设备不仅是埃及面对来自运河东部沿岸攻击所作出的回应,更

体现出埃及的战略意图,即在联动式综合防空体系的掩护下,埃军将能够在短时间内突破以色列的空中防御,快速穿越运河,在西奈夺取桥头堡。直到十月战争期间,以色列和美国才认识到这一做法的意义。

## 国民心理与民族精神的振奋

一般说来,战争对国民心理、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等具有潜入、溢出、辐射效应。这既是无法估价的社会文化利益,也是一种政治利益。<sup>④</sup>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战争能够教育、锻炼和唤起人民的政治觉悟。正义战争可以从正面教育人民,使人民在战争中变得坚强、团结,并学会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各种手段和方法,直到最后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建设和管理自己的国家。<sup>⑤</sup>当战争取得胜利时,其精神激励效果是随着被击败的军队数量的增多而增大的,但精神效果不是以同等的比例,而是以更大的比例在增大,也就是说,不仅在范围上增大,而且还在强烈程度上增大。<sup>⑥</sup>

“消耗战”的发生激发了埃及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怀,转移了他们对军队权力更迭关注的视线,稳定了纳赛尔的统治政权。特别是以色列一再向埃及纵深轰炸后,进一步激化了埃及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紧密地团结在纳赛尔周围,一切以对以色列战争为先。“消耗战”期间,埃及人民积极筹备建设堡垒、炮位、公路和其他地对空导弹需要的配备设施等,到1970年底,埃及建设或加固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堡垒和140万平方公里的其他武装设施,铺设了数万公里的公路。一些学者由此称上述建设为“第二个阿斯旺大坝”,把埃及人民团结起来了。<sup>⑦</sup>另

<sup>①</sup> [美国] 小隆·阿·诺迪安:前引文。

<sup>④</sup> 参见余爱水著:《军事与经济互动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sup>⑤</sup> 参见陈鸿茜、王成业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sup>⑥</sup> 参见[德国]克劳塞维茨著;王小军译:前引书,第23Q 248页。

<sup>⑦</sup> Mohamed Hassanein Hekal *Road to Ramadan*, Balkur time Books 1976, p. 89.

外，战争的持久性使埃及公众对战争的适应能力增强，驱散了他们面对战争突发时的过度恐慌。特别在面对以色列的空袭时，人们不再如“六日战争”时那样不知所措，公众已经学会如何应对空袭的来临。

更为重要的是，“消耗战”重新建立了埃及军人的自尊、极大鼓舞了士兵的士气、摒除了不利于作战的传言，为以后军队进行更加艰难地收复失地的战争奠定了精神基础。“六日战争”后数周内，埃及军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愤怒的群众涌上街头，唾弃、诅咒他们之前引以为傲的英雄，各种羞辱军队的玩笑充斥着整个埃及。尽管埃及军队制止了以色列军队的推进，但他们急需证明自己的战斗力。“消耗战”给埃及军队提供了这种宝贵的机会，战场上的胜利使得埃及军队重新受到国内人民的尊重和认可，并且帮助埃及军官解决了部队中存在的严重心理问题，即以色列士兵跟正常人一样，并没有什么非凡的力量。

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好友海卡尔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高度评价了“消耗战”对埃及军民的积极影响，“‘消耗战’对激励埃及民族感情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因素，它培养了人民在精神动员状态中生活，它向军队灌输了连续作战的意识。这一切都鼓励了下列感情：拒绝一切被认为是外部势力或主张可知的东西。”<sup>1</sup>

## 对 外 交 往 中 泛 阿 拉 伯 主 义 的 弱 化

战争是外交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的继续，是外交失败后的另一种寻求和平的人类交往行为。<sup>④</sup>外交活动能够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加速或延缓战争的进程，也是最终实现停战的一种方式。战争亦可以影响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反应，战争可以带动外交影响内政。战场上瞬息万变，为了实现战争的政治战略目标，一国特别是小国，就不免要对外寻求盟国，尤其是超级大国的支持，而这一系列活动的深入展开有可能最终影响其内政。

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想是其民族主义思想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的体现，它越出了埃

及的界限，主张所有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最终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阿拉伯人的统一国家或联邦。<sup>④</sup>泛阿拉伯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以埃及为核心实现阿拉伯的统一和奉行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即不结盟思想。但在“消耗战”期间，面对收复失地的困难和紧迫，纳赛尔不得不对其一再坚持的泛阿拉伯主义作出调整。

首先，纳赛尔放弃之前一再明确的要以“埃及”为核心统一阿拉伯世界这一宣传论调，开始更多地强调“阿拉伯的团结”。在外交上，埃及政府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手段，改善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与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试图努力挽回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重新支持。1967年8月9日，阿拉伯首脑会议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为了得到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政治支持，开展“消耗战”，纳赛尔不仅很快与沙特就也门争端达成了协议，而且同意了沙特、科威特与黎巴嫩提出的解除他们对美国和西欧国家石油封锁的承诺。<sup>1/4</sup>由此换来沙特、科威特和黎巴嫩对埃及的承诺，即每年给予埃及950万英镑。<sup>1/2</sup>

其次，不结盟思想成为纸上空谈。纳赛尔的喀土穆之行缓解了埃及与阿拉伯世界保守派的矛盾，营造了阿拉伯世界团结的氛围，提升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有利于埃及全心关注西奈问题，进行“消耗战”。但埃及也为之付出代价。喀土穆峰会最后达成的“三不原则”<sup>3/4</sup>使纳

<sup>1</sup> [埃及]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著；钟飞 辛华译：《斋月战争》，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9页。

<sup>④</sup> 参见[德国]克劳塞维茨著；王小军译：前引书，第124页。

<sup>④</sup> 周青等主编：《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3页。

<sup>1/4</sup> 石油生产国认为对美国 and 西欧的石油封锁不仅在当时没有对美国产生任何效果（60年代末美国石油仍能自我供给。欧洲和日本的石油能从拉美的大量生产中得到供应），而且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损害了阿拉伯石油生产国自身的经济来源。

<sup>1/2</sup> 每年埃及由于苏伊士运河关闭损失100万、旅游业损失400万、西奈石油损失200万。See Varda Ben Tsvi “From Khartoum to Rabat”, in Shamir Yehudit HaNasserism, pp.270-271.

<sup>3/4</sup> 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不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

赛尔除了向阿拉伯国家和苏联求助外，无其他有效的外交途径可走。1955年万隆会议后，纳赛尔就把不结盟思想扩展到了阿拉伯统一运动中，用来处理阿拉伯世界同非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立主义不仅是埃及取得联合的政策，也是其赢得外部世界好感的工具。纳赛尔在阿拉伯统一运动中倡导积极中立政策，也带有排除大国插手阿拉伯事务、保证埃及领导权的目的。<sup>1</sup>然而，面对20世纪60年代末的现实处境，不管是重建埃及的国防力量，还是开展和扭转其在“消耗战”中的不利态势，抑或是积极应对国际环境的压力，埃及都必须深深仰仗苏联。纳赛尔一生总计访问苏联6次，仅在“消耗战”期间访问苏联的次数就有3次，他曾经高喊的“绝对不插红旗、不建基地”的豪言壮语被完全打破。虽然埃及与苏联之间并未签署任何有关结盟的文件，但正是这一时期两国从外交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军事层面的互助，建立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埃及与苏联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两国事实上的结盟还对埃及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产生了影响，铁托对纳赛尔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温和反应表示不满。但随着战火硝烟暂时熄灭，埃及与苏联间的矛盾逐渐凸显。

## 结 语

总的来看，战争对一国经济的打击是十分巨大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战争对一国领土主权以及其他方面的积极作用。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加以衡量。”<sup>④</sup>因此，“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

或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sup>④</sup>“消耗战”是埃及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而进行的战争，其战争影响是多维的，包括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军事层面、社会文化层面等。因此，我们对战争影响的认识需要有辩证的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

笔者认为，“消耗战”期间，埃及完成了军事和精神领域的建构。在军事上，可以说埃及首次具备了进一步打击以色列、收复西奈半岛的现代军事力量；在精神领域，埃及军民克服了震惊、抱怨、怀疑、恐惧等不良情绪，重新恢复了民族自信心，民族凝聚力也得到加强，全国范围都做好了进行下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消耗战”暴露了埃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端，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不能最大限度为国家安全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等，加速了埃及改变经济模式的步伐。此外，“消耗战”弱化了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及不结盟思想，对这一时期埃及与苏联、美国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

可以说，埃及最终能够通过有限战争的初步胜利和外交斡旋，成功收复西奈半岛，“消耗战”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sup>1</sup> Richard H.air Dekmejian, *Egypt Under Nasir: A Study in Political Dynamics*,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Ltd, 2001, p. 117.

<sup>④</sup> [德国]克劳塞维茨著；王小军译：《战争论》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02页。

<sup>④</sup> 同上，第989页。